

第一章 哲学和家庭罗曼司

弟子们的两难

《海德格尔的弟子》的主人公——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卡尔·勒维特和赫尔伯特·马尔库塞——是不具有犹太意识的犹太人，他们自认为是众人熟知的“具有犹太血统的日耳曼人”。作为哲学上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令人崇敬的日耳曼精神和教化理念中，而不是在犹太文化传统中，找到拯救和意义。所有这四个人都曾师从日耳曼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一直到1927年才出版里程碑式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但是在此之前，作为一名讲师和教师，他的天赋已经为他赢得相当高的声誉。

海德格尔的犹太学生是他最聪明的学生。在20世纪哲学和文化界里，我们要考察的每一个主人公都占有明确的一席之地。汉娜·阿伦特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1]在其晚年，汉斯·约纳斯被捧为德国环保主义首席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赢得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权威和新左派导师的声望和名声（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受到过教皇本人的谴责）。卡尔·勒维特1956年重返德国，成为战后主要的哲学家之一。此外，海德格尔本人的导师，海德格尔把《存在与

时间》题献给他的哲学家艾德蒙·胡塞尔也是犹太人。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狂热效忠，随之而来的讽刺是意味深长的：这位弗赖堡大学纳粹校长，曾经是胡塞尔的助教，反而受到这些天才犹太弟子的拥戴。

不过，海德格尔态度的前后变化并不像表面上初看之下那么一目了然。在海德格尔的“弟子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虔诚的犹太人。作为受到日耳曼精神诱惑而被同化的犹太人，其人格的鲜明的犹太维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难以识别。勒维特实际上改信了新教。约纳斯年轻时受过一些犹太教育，晚年出版过讨论大屠杀之后神学主题的颇有影响的著作。但是在其主要哲学著作中，犹太影响的痕迹仍然可以忽略不计。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阿伦特给“青年阿里亚”工作，这是一个以巴黎为基地的组织，帮助把犹太人弟子送到巴勒斯坦。不过随着犹太人代理机构 1943 年的《巴尔的摩宣言》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的拒绝，她变成了犹太复国运动最激烈的批评家之一。虽然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海德格尔的世界观绝没有摆脱潜伏在自由魏玛共和国表面之下的普通反犹太主义，但是他从来没有赞同由国家社会主义者发起的激进反犹太主义。对他而言，只要它试图用简化的生物学术语解释“实存”问题，这个见解在哲学上便是站不住脚的。对海德格尔来说，生物学是 19 世纪唯物主义的基本典范，以“实存”或“大在”的名义，那种唯物主义必须被扬弃。

本书是小心翼翼地研究海德格尔众多犹太弟子的一个专著。它将研究他们的思想取向、学说和政治信仰。因此，它跨越了哲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的传统学科界线。那么这项研究将给我们一些什么教益呢？

从一开始，我们需要了解曾经主导海德格尔思想全球传播的某些情形，尤其是战后时期由于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政治过失而被剥夺教职的情形。由于海德格尔的弟子们的态度往往被当做决定海德格尔观点应当如何被接受的工具，所以《海德格尔的弟子》部分地是一项接受史方面的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界，在思想实体和其接受之间不存在绝对分离的观点已经是常识。早在这些观点流行之前，哲学家兼

批评家沃尔特·本雅明提出了一个相关见解：“作品是意图的死亡。”^[2]一旦被物化之后，学说和观念便倾向于违抗其作者的意志，去过它们自己的生活。通常，注解和解释逾越了作者意图的专有主张：很少有作者是自己作品的最佳法官。这样，通过考察海德格尔天才犹太弟子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将自然对这位哲学家思维方式的丰富性和局限性获得新的见解。

因为其犹太弟子凭着自己的能力已经成为广受称赞的思想家，所以《海德格尔的弟子》也是一部研究“影响的焦虑”的专著。^[3]依照大多数现有的考虑，作为教师和导师，海德格尔的影响力是极其深远的。很少有学者经历其充满魅力的讲座和研讨班被原封不动地延续的情形。通过接受相同的教诲，在他的强有力哲学影响之下，弟子们往往难以使自己脱颖而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这是甚至他最杰出的弟子也被迫面临的两难。毋庸赘言，这样的问题在其极具天分的犹太弟子身上变得更加复杂化，在日耳曼反犹太主义聚焦点上，这些人通常第一次体验到了他们的犹太身份。对这些弟子来说，由于难以对付的往往是某种地道的海德格尔风格或构架，以已经可以谈论的和尚不可以谈论的方式，只要海德格尔学说落入由“日耳曼灾难”框定的控制轨道里，思想个性的两难便是双重可怕的。同时，作为亲眼目睹德国震撼政治退化的见证人，海德格尔的“弟子”能够就应对这场灾难负责的精神条件提供有价值的证词。不过，那个特许的接近往往在实存意义上和在哲学意义上被证明是有麻烦的。他们作为日耳曼思想和文化的学生所吸收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已经受到了有害的日耳曼思想和文化的毒害？除非他们死了，许多人将一直追问相似的问题。

在希特勒独揽大权以及海德格尔同纳粹政权短暂的——然而串通一起告发他人的——共谋之后，他的“弟子”竭力用将海德格尔哲学化的办法来抵抗海德格尔，借此希望挽救能够被挽救的东西，同时所有弟子都千方百计地摆脱他们的导师长期的强有力的影响。就这方面而言，《海德格尔的弟子》讲述的是海德格尔犹太弟子寻求新起点的故事。但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海德格尔的弟子既是他的同时代人，也

是他的晚辈。从根本上讲，他们受到了同一个时期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那些转型也造就了海德格尔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他们为摆脱他的广泛影响而做的努力很少取得成功。也就是说，无论愿意不愿意，所有弟子都曾经接受有关政治现代性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偏见——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等等——使人很难说清战后世界有意义的理论立场。尽管所有弟子都逐渐反对海德格尔学说的具体特征（他晚期半神秘的“存在思想”或大在哲学是一个经常受到攻击的目标），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都分享着他的许多既保守又革命的“时代诊断”。通常，接受哲学家海德格尔导致评论家忽视海德格尔作为“文明批评家”的极有影响的身份。但是他的人格的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的；哲学家和世界观的严格分离是难以维持的。^[4]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也是他的弟子大多分享的观点：现代是一个“绝对充满罪恶的（费希特）时代。因此，使之陷入深渊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对于“前线一代”来说，海德格尔和他的弟子们都属于这一代（实际上，海德格尔、勒维特和马尔库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服过兵役），鲜明的虚无主义举动是以下信念的必然结果：在具有永恒价值的事实被建立起来之前，全面的摧毁是必要的。^[5]

《海德格尔的弟子》也重新探讨了如何看待思想家海德格尔和以国家社会主义闻名的政治运动之间非同寻常的意识形态和亲性的问题。在第七章，我试图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把最近出版的那个令人不安的1934年讲座讲义作为这项工作的出发点，在那个讲义中，海德格尔借助于不切实际的“本体论法西斯”——服务于存在思想或“大在”观念的国家社会主义——阐发了自己的信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否认在海德格尔哲学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因果联系似乎仍然是行得通的。不过，随着雨果·奥特和维克多·法里亚斯的开创性传记著作的出版，海德格尔转向作为能够挽救人类免于无休止虚无主义命运的神奇领袖希特勒的现实已经令人信服地被建立起来。^[6]同时，以下断言是不明智的：海德格尔的政治失误，无论多大，将多少否决他的杰出哲学成就。相反，事情的真相将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每一位海德格尔的

犹太弟子都被迫面对以下难题：作为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带有鲜明日耳曼精神且对其推崇备至的传人，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欢迎一个似乎代表着全盘否定哲学和文化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语境中，有必要唤起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反省，马尔库塞在 1948 年给海德格尔的一封信中以如下方式提到了这个问题：

一个哲学家会被某些政治事务所蒙蔽；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公开承认他的错误。但他不能被一个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遭到屠杀——的政权所蒙蔽，这个政权使恐怖气息遍布于日常现象之中，它把生命、自由和真理理念统统抛诸于脑后，代之以血腥的对立面。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政权是对您自己曾经那么坚决而有力地论证其合理性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致命讽刺。^[7]

在这段话中，马尔库塞强调要时时牢记重要的一点：纳粹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暴政的暴政，是史无前例的政治恐怖形式。的确，它的可怕终点——奥斯维辛——从其准卓别林风格的开端是难以预见的；但是那些开端——划一革新（Gleichschaltung）、大逮捕、集中营、疯狂反对犹太人——都已经荒唐透顶。对于针对他的质疑，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声明放弃这个荒唐的终点，放弃变成 20 世纪工业化大屠杀象征的死亡集中营。此外，他对这个问题的哲学反思就事论事，多半没有说到点子上。在他看来，纳粹的种族灭绝政治学可以归结于“技术学”罪恶、“现代世界图画”的“失真”、后笛卡儿的“通往意志的意志”或“大在的遗忘”。因此，他颠三倒四的“元政治学”解释只是为了强调：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失真从一开始便促成了纳粹政治的成功。

海德格尔的“堕落”

假如海德格尔 1933 年没有命中注定的政治失误 在当时 带着大肆吹捧，他加入了国社党，并被任命为弗赖堡大学校长，那么传记作家们可能没有多少东西可写。海德格尔有意反对到他巴顿老家以外的地方去旅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怀着对地方主义品德的坚定信念，他两次放弃了到柏林大学任教的机会。《我们为什么待在乡村》一文读起来像是对德国“血与土”话语的戏仿。^[8]

不过，海德格尔同纳粹的调情虽然短暂，却有一定的传记价值，这对评价他的思想价值至关重要。任职一年后，海德格尔从弗赖堡大学校长位子上退了下来，但这件事已经产生足够严重的损害。他已经有效地把这所大学朝向“德国革命”的目的和目标。站在讲台上，他证明自己是一个代表新政权的有效宣传家，他曾经用下面的断言结束演讲：“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现实和法律。”^[9]

1933 年 5 月，海德格尔发了一则密电给希特勒以示与最近的“划一革新立法”保持步调一致。存在着政治告发和人格背叛的几个实例。此外，一直到纳粹政权快要倒台之时，海德格尔是一位按时缴纳党费的国社党党员。他继续以所谓的“祝愿德国”或“嗨！希特勒！”作为上课的开讲词。1936 年他向勒维特表露他的心迹时写道：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衷是出于他的哲学的本质”他声称它来自《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概念（那个概念强调本真历史承诺的重要性）^[10]

作为弗赖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被指控实施了所谓《保护常设公共服务法》的反犹太人条款。该条款有效地剥夺了犹太人从事政府服务包括大学生活的所有机会。尽管他后来发表了各种否认声明，但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全心全意地实施了这些法律，即使那样做意味着剥夺胡塞尔从事哲学系图书馆工作的机会也在所不辞，而他欠胡塞尔的又是那么多。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这个做法如此严重地伤害

了这位德高望重的现象学家，使得海德格尔成了一名“潜在的谋杀者”。^[11]在当时，胡塞尔曾在写给前学生的一封信中强烈抱怨海德格尔日益膨胀的反犹太人思想。胡塞尔写道：“最近几年，他的反犹太人思想日益显著，甚至在处理对他忠心耿耿的那些犹太学生时也是如此。”他继续写道：“最近几星期的事件（指海德格尔加入国社党以及这所大学驱逐犹太人）已经戳到了我的实存的最深根基。”^[12]

1929年，海德格尔抱怨德国已经面临严峻的抉择：“要么通过重新引入真正本土的教师和教育家，维持我们日耳曼的思想生活，要么放弃它——既在广义上也在狭义上——任凭日益增长的犹太人势力泛滥。”^[13]按照海德格尔的学生、哲学家迈克斯·穆勒的说法，“自从海德格尔当上校长那一刻开始，他便不允许犹太学生跟他攻读学位，而其中有些人已经开始做学位论文”^[14]。他以如下冷酷无情的声明打消了一位博士候选人的希望：“你搞清楚，弗劳尔·明茨，我没法给你做指导，因为你是犹太人。”^[15]在一封主动投寄的书信中，他试图阻止艾道得·鲍姆加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外甥）的学术任命，海德格尔抱怨道“鲍姆加登有‘自由民主’出身背景，在美国逗留期间已经‘被美国化’并且同‘犹太人艾道得·弗兰克尔有牵连’”。^[16]

随着纳粹政权的倒台，海德格尔为他的过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大学反纳粹委员会发现，在纳粹政权最初几个月里，海德格尔借着自己的名气和声望参与了纳粹政权，在另一些德国学者看来，海德格尔帮助纳粹使其政权合法化了。在诉讼期间，哲学家雅斯贝斯提供了一封专门表示谴责的评估信。雅斯贝斯断言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不自由的”、“专政的”。雅斯贝斯得出结论道：“我认为，假如放任这样的教师去影响今天的年轻人，而那些年轻人在心理上是极端脆弱的，这将是非常错误的。”^[17]海德格尔被中止了教书的权利并准予退休。自以为是自从赫拉克利特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这个人没有很好地接受这项裁定。由于心情郁闷，他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按照最近的一些报告，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18]

海德格尔的弟子们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导师犯下政治过错的痛苦事

实。出于对他的敬重，他们向他伸出了援手。然而这个过程困难而漫长，有时无所适从，不知该从何做起。作为年轻人，他们坚信，得益于从这位弗赖堡哲人身上获得的许多教诲，他们正在走向未来哲学的顶巅。像海德格尔其他弟子一样，他们感到，他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实存’哲学，结束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学院哲学——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陈腐学究习气。他突然转向国家社会主义这件事几乎令他的所有学生，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大感惊讶。不过，假如细心地品味他早期实存哲学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他的政治转向似乎不是毫无来由的爆发。^[19]在本书结束语《存在与时间》，一部失败的巨著？的结论中，我考察了海德格尔在他的这部 1927 年的巨著完成之前的哲学道路，从而证明，事实上从一开始，是他的思想的‘反文明’因素，而不是更晚一些的积累，为他的计划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到了 1933 年，他的犹太学生被迫去考虑，在流放压力和困苦之下，是否存在着同诱使海德格尔去拥戴纳粹政权的实存哲学相吻合的东西。也许汉娜·阿伦特的初始反应最为极端：她自己承认，她在大约 20 年时间里放弃了哲学。^[20]迟至 1964 年，这位《人的条件》的作者仍然不愿意被人称做‘哲学家’（她喜欢被人称做‘政治思想家’），她的同学大多赞成，海德格尔哲学的“激进”部分是隐藏在他的政治失节背后的催化剂。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形是，被视为他的伟大性的这个因素——他对同所有先行哲学范式 and 传统决裂的坚持——也被证明是他的过失。他的学生们认识到，当不妥协的思想激进主义转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时，其结果便是灾难性的。

从那以后，逐渐同德国思想的过去妥协的艰难过程便产生了。海德格尔的第一位学位论文学生，卡尔·勒维特，以最漫长的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勒维特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反映了不仅毒害德国而且毒害整个西方的某种精神毒药，他想要找出 19 世纪危机的思想根源，当时有教养的人放弃了德国古典主义（歌德和黑格尔）的平衡，为存在主义、科学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极端学说敞开了道路。^[21]约纳斯和阿伦特也在西方人道主义那里找到了一种“浮士德-虚无主义”链条——分寸感和

“ 限度感 ” 的丧失 —— 它似乎同现时代鲁莽地走向深渊相呼应。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即使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因为 1945 年 5 月 8 日盟军的胜利而终结，虚无主义的危险也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暴露。换言之，他们亲身见证了现代技术的表现：核毁灭的危险、环境灾难、星际间的迷失方向。因此，在《人的条件》的开始几页中，阿伦特雄辩地指出了一代人的各种忧虑：

1957 年，一个由人制造的出生于地球的物体被送往宇宙，几个星期里他按照使星球 —— 太阳、月亮和行星 —— 运行的相同的地球引力规律环绕地球旋转……然而，不必对充满人心的人类力量和主宰的伟大感到骄傲和欣喜，虽然当人们从地球仰望天空时，他们可以找到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直接的反应……是为“人类逃避囿限于地球迈出的第一步”感到欣慰……这个声明的惩罚不会使我们忽视它其实有多么地非同寻常；因为虽然基督徒一直把地球说成是一个苦难所，虽然哲学家把肉体看做心灵或灵魂的牢房，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以前没有人把地球视为人的肉体的牢房，或表示要从地球迁到月球的渴望。^[22]

在《责任律令》（1984 年）一书中，约纳斯就由无法控制的现代技术的增长而造成的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提出了相似的反思：

我的主要忧虑关系到来自技术文明本身的客观动力的可怕威胁，那种威胁内在于其结构，无论愿意与否，它都会可怕地爆发出来：“极端可怕”的灾难、排放、污染、大地荒芜……大黑暗的可能性……生命世界的全球灾难……“人人为我”成了普遍的战斗口号，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绝望的一方将诉诸于原子战争的最后手段。^[23]

按照这个上下文，有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对原来的海德格尔主义者来

说，虽然做出了各种努力，但要想完全避开这位大师的影响，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毕竟，阿伦特和约纳斯除了选择地球技术学对现代社会的不利影响以外，他们无法选择更有代表性的海德格尔论题。^[24]

在我们的四位主人公中间，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多少是一个例外。阿伦特、约纳斯和勒维特仍然或多或少地维持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轨道之内，而马尔库塞对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左派的信仰则产生了一个极其不同的思想方向。因此，尽管阿伦特、约纳斯和勒维特经常采来自经典旧籍的规范和政治含义（海德格尔也是如此，他赋予“古希腊开端”无与伦比的历史重要性）。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影响下，马尔库塞以无阶级社会形态的未来设计他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在黑格尔的强大影响下，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是鲜明地异端的：他同超现实主义者保持一致，他从他们那里吸取了“伟大的拒绝”观念。他发表了广泛讨论弗洛伊德的作品，他撰写了有关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批判专著。借助这些非同寻常的兴趣，我们也许对以下情况不会感到特别惊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他就已经产生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综合起来的想法，并且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讨论“历史性”问题的申请教职的资格论文。

不过，只要透过表面向深层挖掘，我们就在马尔库塞政治思想中找到对犹太弥赛亚传统的明显质疑，而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生的中欧犹太知识分子来说，那个传统成了为人生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所举行的仪式。即使到了 1900 年，有关普遍平等的后革命诺言对缓和西欧犹太人的困境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们的中欧兄弟姐妹做着同化梦想由于此起彼伏的反犹太人的恶毒浪潮而破碎了。结果，对中欧犹太人来说，“自由选择”似乎把它自己给淘汰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好像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出路。这样，随着同化希望的破灭，唯一的可能性似乎要么依赖于政治激进主义，要么依赖于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一个真正的犹太身份。安森·拉宾巴赫很好地描述了隐藏在这个路径背后的历史动力：

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德国犹太人的自信和安全感受到了一种新犹太伤感意识的挑战，无论在情调上还是在内容上，那种伤感意识都可以被描述为激进、世俗和弥赛亚的。这股新犹太风气拒绝接受的，首先是把教养概念作为日耳曼犹太人秘诀来熏陶的日耳曼犹太人一代的乐观主义。他们受到德国上层阶级政治反犹太和反自由精神的深刻震撼。后者怀疑解放后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假定。特别令人恼怒的信仰是，在日耳曼民族特性和犹太民族特性之间不存在矛盾；世俗化和自由主义将把犹太文化融入日耳曼民族共同体之中。^[25]

拉宾巴赫描述的这种伤感意识的古典代表人物是恩斯特·布洛赫和沃尔特·本雅明。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犹太政治弥赛亚的论题才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得到了显现。在《小说理论》前言中，乔治·卢卡奇提出了术语“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用来描写中欧知识分子一代，他们既对欧洲迅速工业扩张感到忧虑，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副作用担心。卢卡奇提到：“他们的工作的立足点在于想把‘左派’伦理学和右派‘认识论’混合起来……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这个观点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只要想到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1919,1923 年）和《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想到沃尔特·本雅明，甚至想到阿多诺的初始之作，等等。”^[26] 马尔库塞无拘无束的革命探索，对现代工业文明不合理性的广泛批判，使他成为前面提到的那个团体的直接传人，虽然他的弥赛亚倾向总是被其他思想影响和传统所中和，首先是被完全非弥赛亚的、对“历史中的理性”力量的黑格尔式信仰所中和。

海德格尔的突破

《海德格尔的弟子》也探讨了 20 世纪思想生活中一个重要思潮的命运：存在主义，这股思潮随着海德格尔 1927 年巨著《存在与时间》的

问世而诞生。只有在极少数情形之下，一部哲学著作有着如此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它问世之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当他还是马堡大学助教的时候，来自德国各地的研读哲学的学生便来听他的讲座课和研讨课。不过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 量变转化为质变 对他的学说的世界范围的关注便真正开始了。受之于克尔凯郭尔、尼采和狄尔泰（不必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里尔克的文学源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从根本上改写了哲学思想术语。同他的无法被同化的新词和修辞魄力相比，所有以往的范式和概念都相形见绌，毫无希望地显得陈旧过时。

假如以《存在与时间》为中心来展开思想叙事 那么 对海德格尔的弟子们来说，同这部作品的遭遇，对它所展示的历史当下的激进性批判，以多种途径变成了他们的确定生活经历，为此，我决定把评论海德格尔完成这个著作的原始动机的附录也包括进来。如我们现在已知的那样，包围它的开端条件并非一目了然。相反，它的合成取决于大量环境系数：传记的、忏悔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这些系数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渐为世人所知。在重构海德格尔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的尝试中，我广泛依赖于来自《海德格尔文集》（*Gesamtausgabe*）最近出版的课程讲义，那些讲义对我们了解这部现代思想里程碑著作（《存在与时间》）的生成是必不可少的。

自从笛卡儿以来，认识论问题一直是现代哲学的焦点。在《存在与时间》的开头 通过返回到“大在的问题”海德格尔剔除了加诸于整个后笛卡儿概念系谱的某些中伤。认识论的成功原本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相一致。但是这份遗产的获得似乎以某些更基本的人类问题为代价。在尼采猛烈抨击民主、道德和宗教之后，西方人道主义的奉承话，除了给人虚假的安慰以外，似乎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空洞确信和担保似乎仅仅代表着现代虚无主义断言的虚饰。通过明确地提出现代虚无主义的问题，尼采为下一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建立了论辩参数。比如他在《权力意志》中令人记忆犹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27]。

虚无主义就站在门口，这个最不可思议的不速之客是从何而来的呢？……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找到“何以如此”的答案……激进的虚无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尽管实存是人们公认的最高价值，但是实存仍然是绝对靠不住的。附带提一提下面一种认识，我们根本无权设置或许是“神圣”或道德化身的事物的彼岸者或自在者。^①

凭借这些说法，尼采显然决定了哲学传统路径的命运。他称他的新方法是“带着锤子进行哲学研究”。他声称他的作品“诋毁的尝试”是“炸药”同哲学研究之类的事情无关。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开设了一门由多卷讲义组成的讲授尼采哲学的课，他认为尼采思想是理解现代困境的关键。在20世纪20年代初同尼采的遭遇使他相信哲学的传统概念适应不了历史当下的重大使命：技术学问题，大众社会问题，社会“调整”问题。斯宾格勒在鸿篇巨著《西方的没落》中已经充满启示力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对先验哲学失误的回应。海德格尔反对笛卡儿的起点“我思”或“思想实体”，因为它充塞着太多实体性的令人误解的先人之见。把非实体的主观性作为哲学的起点使人预先便遵循一定的设问路线，导致一组可预见但无结果的回应。为海德格尔所喜爱的新词汇，选自口头德语，表明了他对非科学新开端的强烈偏爱。它的出发点是此在的不可还原的“被设定性”或“在世之在”。不像现代认识论的理论“主体”，海德格尔的此在由它的心境、它在面对无聊话题时保持沉默的能力、它的“面向死亡之在”来规定，而不是由它的“清楚明

我根据英文译成这一段话，它同《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本有较大出入。现在我把张译本的译文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激进的虚无主义，就是认为生命根本是靠不住的信念，假如指的不是人们公认的和讨价还价的最高价值的话。附带提一下这种认识，即我们丝毫无权规定彼岸，或物的自在，后者似乎是‘神性的’似乎是真正的道德。”参阅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199、280、294页，商务印书馆，1988。——译者

白的观念（洛克）能力或三段论推论来规定。

否认海德格尔的实在行动过程的成就是愚蠢的。它提供了一种表达生命或在世之在的方法，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作为认识论的哲学的理论立场。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它的盛期正好与海德格尔青年时期相重合，哲学面临着被贬为科学研究的侍女地位的危险。海德格尔的实存途径再现了对哲学领域这个危险缺点的建设性纠正。

今天，哲学系受着语言分析方法的统治。不过，这个哲学流派代表了缩小哲学影响和范围的另一种方式。曾经在海德格尔丰富的现象学探索中占据着重要地盘的实存问题似乎已从哲学视野中消失。历史和社会批判也似乎已经丧失它们的地盘。维特根斯坦曾经断言，语言游戏务必被理解为“生命的形式”，但是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评价它们的相关优点和缺陷的方法，因为作为“生命的形式”所有语言游戏都在内在意义上具有意义。因此，哲学的目标应当是治疗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消除各种误解，而不是确立实证的目标或议程，是思想应当追求的目的。我们被告知，哲学应当更加相信常识或日常语言实践。正如一位知觉批评家评论的那样：

语言哲学不仅被理解为治疗或安乐死，而且被理解为预防，是对必然呈现的危险的预防。这是守夜人的哲学理论：它自己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实际贡献，它必须提防各种可能的滥用，那些滥用将干扰或混淆真正的知识。^[28]

语言学路径的重大不足在于，它缺乏强有力的评估能力，缺乏对深远意义做出概念区分的能力。^[29]维特根斯坦的警句似乎很好地抓住了它的沉默主义：“哲学要让每一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此外，随着哲学的职业化，专业化的相应维度也提了出来。把哲学同生活世界或“日常性”——人类社会的经验基础——重新联系起来，哲学因此而再一次变得有意义的前景似乎日益暗淡。

海德格尔看到了传统哲学的这些缺点，他发展了他的实存范式来

弥补这些缺点。他的路径的承诺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不过当人们遇到具有海德格尔那样非凡天赋的思想家时，这种审视不得蜕变为圣徒列传或无批判奉献——连续的引诱。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哲学能够捕获且呈现一种原初经验，因此它本能地对立于现代思想的肤浅性。不过他往往无法解释为什么原初事物本身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它内在的优越于他认定是误入歧途的当代哲学路径。为其立场和偏好提供“合理解释”从来不是海德格尔的专长。除了其优点以外，他的路径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经常推崇“远古经验”和“非理性”。它对反民主的伤感情怀念念不忘，海德格尔本人颠三倒四地把那份情感看做一份奖励。所有这些偏见在他 1933 年走火入魔的政治失误中发挥了作用。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总体上充满溢美之辞——不得不去清理使其贸然投入纳粹怀抱的那些思想线索。要是他们不这么做，他们保留他的遗产的企图将仍然受到许多相同失察和概念失误的影响。因此，像古希腊悲剧一样——虽然处于一个较小的范围里——父亲的罪恶将在其子女身上遭到报应。

注 释

[1]毋须赘言，这些假定的荣誉不可避免地存在随意性。另一些可能的竞争者是列奥·施特劳斯、安东尼·葛兰西、卡尔·施密特。后两者的思想已经被折中成为某种与左派和右派政治极端主义相接近之后的产物。施特劳斯——尽管他具有哲学作品读者特有的敏锐性——就像他那些德裔犹太移民伙伴一样，尽管他对美国新保守主义产生了短暂的影响，但他似乎与现代政治要求保持了奇怪的距离。在这个方面，请参阅沙迪亚·杜雷：《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7。关于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的比较，请参阅《汉娜·阿伦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德国移民与二战后的美国政治思想》，P. 吉尔曼斯格等人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2]沃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182 页，J. 奥斯本纳翻译，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77，重点为引者附加。

[3]与这几行诗相呼应的一个现代诗学经典专著，请参阅哈罗德·布鲁姆的《焦虑

与影响》，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4]对海德格尔作品中这个问题的重要探讨，请参阅尤尔根·哈贝马斯：《马丁·海德格尔：作品与世界观》，载《新保守主义——文化批判与历史学家争论集》，S.尼科尔森翻译，140～172页，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
- [5]把虚无主义当做一个普遍现象加以探讨的，请参阅罗伯特·胡尔：《1914—代》，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 [6]雨果·奥特：《马丁·海德格尔：政治生涯》，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93 维克多·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9。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请参阅米切尔·齐莫曼：《海德格尔与现代技术的冲突》，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9。
- [7]《赫伯特·马尔库赛与马丁·海德格尔：书信往来》，载于沃林主编的《海德格尔争论集》，161页。这封引人注目的信函最近重印于马尔库赛的《技术、战争和纳粹主义》一书中，D.科内尔编，263～267页，纽约，鲁特莱奇出版社，1997。
- [8]马丁·海德格尔：《我们为什么待在乡村》载《魏玛原始资料集》马丁·杰、A.凯斯、E.戴门伯格编，426～428页，贝克莱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
- [9]马丁·海德格尔：《德国的大学生》收于沃林编的《海德格尔争论集》，47页。
- [10]卡尔·勒维特：《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德生活》，60页，尤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
- [11]《阿伦特致雅斯贝斯的信》，收于《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斯通信集》，48页。
- [12]胡塞尔：《1933年5月4日的信》，收于《第三帝国中的马丁·海德格尔》，B.马丁编，149页，达姆施塔特，学术图书协会，1989。
- [13]尤尔利奇·塞奇：《德国精神的年轻化》，载《时代》，52期（1989年12月22日），19页。
- [14]《马克斯·韦伯对话录》载《弗赖堡大学报》，92期（1986年6月），13～31页。
- [15]L.魏茨曼：《海德格尔》，638页。
- [16]维克多·法里亚斯在《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209～211页中讲述了海德格尔和鲍姆加登断绝来往的故事。也请参阅托马斯·谢罕的《海德格尔与纳粹党人》载《纽约书评》，38～47页，1988年6月15日。
- [17]卡尔·雅斯贝斯：《致弗赖堡大学去纳粹化委员会的一封信》，转自《海德格尔

争论集》，159 页。

[18]在与海德格尔传记作家雨果·奥特的口头交往中得知。对海德格尔精神崩溃的记载参阅奥特：《马丁·海德格尔：政治生平》，309～351 页。

[19]这个问题的探讨，见 J. 弗里奇：《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历史使命及国家社会主义》，贝克莱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以及汤姆·洛克莫尔德：《论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和哲学》，贝克莱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

[20]参阅阿伦特《“保留了什么？保留了语言”：与 G. 加斯的对话》，收于《关于理解力的论文：1930—1954 年》，J. 科恩编，1～23 页，纽约，哈尔卡特·布雷斯出版社，1994。

[21]参阅勒维特：《欧洲虚无主义：对欧洲战争精神与历史背景的反思》，收于 R. 沃林编：《马丁·海德格尔与欧洲虚无主义》，173～224 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勒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

[22]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1～2 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在引文中，阿伦特无疑夸大了对“从人类受囚于世俗中解脱开来”向往的说服力。尽管这种态度不时被表现出来，但现在似乎只是少数人的想法。而且，要在“解脱”欲望和对新技术可能性的赞美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往往相当困难。在阿伦特那个时代，当时的主流意识则赞美人类开发未知领域的的能力。因此，与哥伦布“探险时代”做比较在当时相当流行。

[23]汉斯·约纳斯：《责任律令：技术时代对伦理的探索》，201～202 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

[24]海德格尔在许多场合使用了“大地技术”这个短语，这说明恩斯特·云格尔的启示性预言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云格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第一次杜撰了这个短语。更多关于云格尔的讨论，请参阅 E. 诺伊曼：《一段可疑的历史：恩斯特·云格尔与后纳粹文化政治学》，贝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

[25]安森·拉宾巴赫：《在灾难的阴影中：天启与启蒙之间的德国知识分子》，27 页，贝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

[26]乔治·卢卡奇：《小说理论》，21 页，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

[27]尼采：《权力意志》，W. 考夫曼与 R. J. 霍林戴尔翻译，7、9 页，纽约，文太奇出